

总摇摇序

当我们步入古代文学的莽莽林海、无际原野时 ,我们为其浩瀚博大而震撼、惊异、兴奋 ;当我们拨开一片片荆丛 ,涉过一条条溪水 ,翻过一座座山梁 ,寻找到自己的一片栖息之地时 ,我们感到慰藉、畅快并充满遐想 ;当我们将一簇簇时光、一堆堆精力、一滴滴心血泼在桌上、纸上之后 ,我们是那样地专注、沉思、忘我 ;然而 ,当我们沿着山壑寻找瑰宝而越走越深邃狭窄的时候 ,当我们脑海里的文化原野被一块怪石、一棵异草所占据之后 ,当我们知诗而不知画 ,知文而不知乐 ,知此而不知彼 ,被问题老人弄得心里淌汗的时候 ,我们才有一天突然猛省 :“专”让我们变得狭隘了。专业愈分愈细 ,研究愈来愈窄 ,人的视域愈来愈小 ,学者的学术空间被挤压得愈来愈扁。于是我们想打破专业壁垒、穿越学科时空、拓宽学术视域的欲望便变得从未有过的强烈。

世间万事万物在差异中无不具有相通性 ,正是这种相通性使万物联系成世界。寻找、发现相异事物间的相通性 ,由此入手可发现单科研究中被长久遮蔽的部分 ,而打开遮蔽部分的过程 ,往往就是原创性生成的过程。

我们寻找与文学相近的学科 ,于是 ,我们发现了经济学。经济学与文学听起来很遥远 ,但两者之间有共同的生命源、生

发点和契合点。经济学与文学的共生点是人的欲求,契合点是满足人的欲求,只不过文学是通过语言隐喻表现人的欲求,并通过想像虚构图景满足人(作者、接受者)的欲求罢了,而经济学则是研究通过怎样的可能性的经济手段满足人现实的欲求。就两者的关系而言,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欲求,生发并规定着人的发展创造欲求,而文学与经济学在研究满足人欲求方面是形影不离不弃的兄弟。有人用“吃”和“说”来形象而浅显地表达两者间的关系。但吃饭和说话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尚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研究的新领域。

这种关系可以从文学生成、发展、演进的动力来加以研究。文学发展的动力,源于人的原欲,表现于生活中的利益,流注于情感。

因为人的本质是追求欲望实现最大化的道义富贵人(道义是富贵实现的条件、手段,又是使富贵变得合理且长久的条件,而追求富贵的最大价值实现则是人的本质),所以,不断的欲求就成为道义富贵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动力,也成为道义富贵人表现情感的文学的发展动力。人的欲求有哪些内涵?西方学者有不同的说法^①,愚以为傅立叶的分法更为科学而清晰。傅立叶将人的需求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与五种感

① 傅立叶将其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与五种感官相对应的五种物质情欲——食欲、声欲、色欲、味欲、性欲;其二为依恋情欲——友谊、爱情、爱荣誉、爱家庭;其三为分配情欲——竞争、多样化、创造欲。此后马斯洛又将需求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马克思则将其概括为物质需求(包括五种物质情欲)与精神需求(包括依恋情欲与高尚分配情欲)两大内容。

官相对应的五种物质情欲——食欲、声欲、色欲、味欲、性欲；其二为依恋情欲——友谊、爱情、爱荣誉、爱家庭；其三为分配情欲——竞争、多样化、创造欲^①。第一类五种生理情欲，正是人的原欲。这五种情欲中最具力量的是食欲与性欲。古人云：食色，性也，讲的正是这两种原欲。食欲是人类一切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欲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基础。说其是原欲，指其他类的欲求是由此生发出来的，是这两种原欲的延展、升华。譬如人要生存就要吃饭。要吃饭就要有土地有粮食。而粮食土地，是要用钱买的，于是需要银子。要银子、粮食，就要去做官，以求获得俸禄、封地。做官要合乎统治者忠、孝、节、义的道德要求，需做道德高尚、有德有才的君子。具备了统治者所需要的德才而做了官，便进一步企求使官越做越大，不但钱粮愈来愈多，而且能够父爵子袭，能够光宗耀祖，能够名留青史，使门庭代代光耀，所有这些都属于食欲文化体系。性的欲求也同样如此。人有性生理的机能，就有性的生理欲求和心理欲求。就有性爱、有男女之情爱，就有婚姻子女，就有家庭，就有约束男女性行为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法律，就有性道德，就有一系列丰富的性文化。傅立叶所言的人的第二类情欲——依恋情欲（友谊、爱情、爱荣誉、爱家庭的需求），正是性欲需求的进一步生发和延展。由此可见，道德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都是食、性需求的延展。

正是人的需求促成了不同文学样式的生成、演变。首先，文体产生于人的需求。当人有了用喉咙、文字、音调节奏表达情感的需求时，便产生了诗歌。当人有了以文字表述对世界

^① 《傅立叶选集》第猿卷附录(圆)，商务印书馆，员愿源年版。

的理性认知和自身情感的需求时,“文”便应需而生。至于戏剧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认为“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出于人的需要。一种是“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有的摹仿本能”,一种是“音调感与节奏感”^①。史书出于人们对国家大事备忘的需要;当人的耳朵有了想听故事的消遣、娱乐愿望时,“传说”与“街谈巷语”先在茶余饭后、田间小巷中慢慢流传起来,尔后逐渐出现了说话、讲故事、小说等形式来满足时间越来越充裕的人们的需要……人类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娱乐的、情感的、美的、奇巧的、现实的、理想的等等)是个不断增长的过程,需求的增长也促进着文体形式质和量的变化,如诗歌由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由古诗、新体,再到近体,由诗到词,再到曲,就是因了人的感情抒发的需求、声音美的需求、娱乐的需求与艺术美的追求而由短到长、由散到密日趋多样和丰富的。

其次,文人的富贵欲求在适应着帝王对于文学的喜好的同时,推进了中国雅文学的兴盛。春秋战国,有志之士为了取得富贵,悬梁苦读,著书立说,纷纷游说诸侯君主,促成了诸子散文的百家争鸣和艺术成熟;汉武帝喜赋,能者擢官,文人趋之若鹜。“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兒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②,汉赋因之大兴;汉末建安之时,“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才士因之而贵;“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③,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章,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

③ 同上。

文人云集响应,五言盛极一时;到了南朝的梁代,皇帝萧氏父子酷爱艳诗,能诗者成为做官的捷径,于是诗人聚集于皇权周围,宫体诗大兴。唐代则将写诗纳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制度形式确定写诗成为获得功名的必备条件,这无疑成为唐诗得以兴盛的重要一着;明清时代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文章定式,举子们呈才于八股,促成八股文创作的高峰时代;而宋词的兴盛使词在城市歌楼酒榭的消费中找到了广阔市场,从而也打开了文人消闲遣情的大门;元代杂剧热闹于大都市、明清小说在发达的商业都市泛滥,又是文学借助于市场财力而逐渐商业化的产物。由是观之,文人对财富功名的追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再次,文的欲求直接规定着文学作品的内容。以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为例,单从作品分析,作者关注最多、花笔墨最多、投入情感最多的地方,必定有其人生最缺失或最得意的东西。缺官位的写做官,缺功名的写功成名就,缺钱财的写经商致富,缺情爱的写郎才女貌、花前月下……写来写去,终不脱生理的需求、心理的欲望,总不出“功名富贵”四字,最终拂不去、掰不开“财色食货”的东西。

傅立叶所言第三类欲求——分配情欲(竞争、多样化、创造欲)是文学发展的第二种动力——利益力。从道义富贵人的假设而言,人的本质在于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作者的利益得失牵动着自身悲喜哀乐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最终沉淀为文人的情感簇,凝结为中国古代文学常见而永恒的两大主题:追求功名富贵的政治主题;书写男女悲欢离合故事的情爱主题。表现上述两大主题题材的作品不仅数量大,而且艺术水平高、感染力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大多出于其

中。再者,文学的传播也往往受利益的支配。市场经济与印刷术发达前的文学传播,主要表现为使作品流传后世的同时所隐藏的传名的利益追求。而印刷术与商品经济发达时期(宋之后特别是明中叶后),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传播便变成一种赢利性的市场行为,以至于一些俗文学的创作、评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稻粱之谋。这些文学现象足以说明利益成为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

情感是人的欲求在现实社会实现过程状态的心理反应,也是人的利益增减得失的心理反应。人的欲求实现则喜,不能实现则悲,遇到挫折困难则愁……喜怒哀乐愁的种种情感无不与人的欲求、利益相关。人的原欲、利益在文学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正是借用情感而表现出来的。用克罗齐的话说,“艺术即抒情的直觉”“是情感给了直觉以连贯性和完满性;直觉之所以真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达了情感,而且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①。作家的创作欲望来自于情感,作品感人的艺术魅力来自于情感,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也来自于情感。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文学的动力来自于人的生理需求特别是食欲与性欲的原欲,利益是这种原欲的理性的现实尺度和生活表现,情感则是原欲实现状态(欲求与欲求实现造成的势差)的生理、心理的自然反映,即原欲与利益的最动人的表现是情感的表现。文学的动力源于人的原欲,表现于生活中的利益,流注于情感。

① 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打通经济学与文学的关系,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其研究的路径有哪些呢?概而言之,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寻找经济与文学在人的欲求层面的共生关系;其二,寻求经济利益与文学表现在情感层面的共振关系;其三,寻找利益情感与精神情感在美感层面的交融转换关系;其四,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在生活层面的共源性、契合性的关系。

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皆由人的原欲生发,故探寻作者、人物、接受者的原欲,寻找经济与文学在人的欲求层面的共生关系,是研究作者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关系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读《聊斋志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写男子与幻形女性(狐、鬼、仙、妖)的性爱纠葛与情爱故事,真令人于扑朔迷离中心驰神往。细究其原因,则是蒲松龄长年在作西宾,远离妻室,过着孤苦凄冷的生活,而主人家妻妾成群,男女间朝欢暮乐,不时刺激了他的性爱欲望。此种欲望愈强烈,因无法实现而愈痛苦,于是不得已,借乌有先生、幻想故事,来满足他的性爱欲望,弥补其性爱欲望难以实现的心理缺失。他笔下的男女性爱,是倾注着自己真实心意情感的。从原欲出发,便找到了作者经济生活、性爱生活与文学生活间的联系,找到了生成作品中故事情感的深层原因和解读文本隐喻的途径。

文学是表现情感的,而情感源于人的利益得失。故而发掘人的利益层面的本事,可以更好地理解情感,更深入地体会文学中的情感。《红楼梦》写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其中颇为精彩的一段是被林黛玉笑称为“笑蝗图”的场景描写:“比我们那里的铁锨还沉”的“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一两银子

一个”的“鸽子蛋”，突如其来的“食量大如牛”的大声自吹，“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①的呆鸡神态。这些生活场景描写使人们在贫富对照的滑稽与笑破肚皮的快感中，在领略贾府“白玉为堂金做马”^②的惊人富贵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穷志短的酸苦。刘姥姥这位与贾母同辈的长者，心甘情愿被一群小姑娘耍笑，更甘愿处处取乐于贾母。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却是打秋风的经济原因，用刘姥姥的话说：“只要他发点好心，拔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壮呢。”^③让贾母“发点好心”的经济原因，使刘姥姥甘愿厚着脸扮演一个取乐的丑角。其情感变化背后的动力来自于利益的驱使。只不过有些情感与利益间的关系表现得间接、隐晦、曲折，不易使人一眼看出罢了。哪些利益情感不易被人一眼看出呢？君子的情感。君子不同于小人之处，在于眼界的高大长远，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是看到长远的利益，不只想到个人的利益而想到天下人的利益。所以君子的情感是更富于政治内涵的情感，更富于道德内涵的情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常见到文人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伤痛之情，抒发自己的政治愿望受到来自奸邪当道、豺狼横行的黑暗势力阻挠而不能实现，从而造成政治悲剧的悲怨愤怒之情。譬如屈原《离骚》所抒发的离别的忧愁；贾谊的《鹏鸟赋》、《屈原赋》中抒发的失落感与忧伤情绪；王粲《登楼

-
- ① 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 ② 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 ③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赋》中洋溢着怀才不遇的伤痛,杜甫的忧国忧民之作等等。无论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情绪,还是政治愿望不能实现的情绪,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利益隐藏其中。只要细加分析,都会发现情感中具体利益的丰富内涵。

生活是经济与文学的中介。所以,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研究文学,我们就要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在生活层面的共源性、契合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文学中是普遍存在着的。譬如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①的文学创作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他人生的晚期。那时曹家早已一败涂地许久,他无所事事,流落北京西郊,靠卖字画为生,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潦倒生活。这种生活与他少年时代在温柔富贵乡所度过的锦衣玉食、“饴甘饕肥”^②的生活形成贫富的巨大反差,而数十年间的人情冷暖,也给他强烈的刺激,于是激起了他创作的欲望,促成了他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③中的《红楼梦》写作。穷困潦倒的经济生活既是曹雪芹写作的环境,也是其写作的动因,同时也是他借此弥补自己“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人生缺憾。此时的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通过写作而融合为一。而且,这种融合也体现于他的故事叙事之中,不时有贫苦人的故事与看破世事冷暖的超逸的表现。

研究经济生活与文学之关系的方法,既注重文本之外的

①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② 同上,第1页。

③ 同上。

作家经济生活,但决不以经济生活的发现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文学文本的自身价值为关注焦点,以文本艺术结构、叙事模式形成原因为分析重心。就叙事文学而言,我们研究人的欲求心理对于小说叙事结构有何影响,研究经济学中的货币交换本能在小说叙事中的表现,研究财色观念如何凝定为财色叙事等。人的欲求心理有其一般性的普遍的顺序结构:因某种环境生发某一欲望;为实现欲望而采取的行为;欲望的结果(成功或失败)。这一心理结构形成了中外小说普遍性的叙事序列结构。叙事学家布雷蒙(另见拙著)将其概括为叙事的三个基本功能序列:表示可能发生变化的功能;表示是否实施这种变化的功能;表示变化是否实现的功能^①。譬如后来署名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刘备求贤的故事。当刘备从水镜先生徐庶口中得知,得孔明者得天下后,便萌生了请其出山相助的愿望。他随即采取行动,三顾茅庐,终于感动孔明下山辅佐,最终成就大业。其叙事结构恰合于布雷蒙所说的三段论。又如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受经济学影响,将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运用于叙事学,提出了叙事学的契约论。他认为,在契约型结构中,叙事可能采取这样的模式来进行:立约—毁约—复约^②。中国产生于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往往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而后被家长阻隔或小人拨弄其间,经过种种曲折,最后结成婚姻。其叙事模式正合乎立

① 布雷蒙《叙事可能之逻辑》,见张富德选编《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15页。

② [法] 粤· 允 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06页。

约(定终身)—毁约(父母或小人)—复约(终成眷属)。而这种从立约到复约的变化,无不体现着利益交换的法则在事件变化中的功用,如《西厢记》中的张生、莺莺的婚姻,《墙头马上》裴少俊与李千金的婚姻风波等。正如法兰西学院院士巴特所指出的:“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然而生产叙事,欲望必须经常变换,必须进入等价物及换喻的系统;或更进一步,为了被生产,叙事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①进入明代中叶后,市民文学迅猛发展,“财色”成为小说、戏曲的叙述重心。或以钱财为叙事的主线,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以十五贯钱作为叙事的关纽,或以钱财隐喻人物的身份价值,如《金瓶梅》中的李瓶儿身份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离不开那串百颗西洋珍珠,她的财富与贵夫人的情怀皆隐喻其中;或写钱财经营者在小说情节中的穿针引线作用,如媒婆、篋片、走门串户的尼僧、算命先生等;或以货币化场景为叙事空间,演出来来往往的人物故事,如酒场、歌楼、茶馆、戏场等,形成特有的财色叙事模式。我们研究经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将文本自身的文学价值作为分析的焦点,而不仅仅是文学之外的经济形态。

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的设想始于 1949 年冬。当初出于多方面考虑,首先是身处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经济对于文人的影响之大,涉及生活的诸多方面:经济与生存的关系、利益与心理情感的关系、经济生活与事业的关系、经济生活与学术研究等都有切身的感受,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经济生活与古代

① [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5 页。

文人的关系,功名富贵与文人的志向与价值追求的关系。再加上,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路径需要不断地开拓创新,时代呼唤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理论和新路径,于是便大胆设想从经济视角探讨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这是其一。其二,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的其他学科都将财经大学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优势与人文学科相结合,走财经人文之路,而中文学科是否可以也走这样一条路?然哲学可以称为经济哲学,社会学可称经济社会学,新闻学也可以称经济新闻,中文学科却不能称经济中文,不能称经济文学。所以曾有一段时间非常苦恼。我们曾想过城市文学,但已有人搞;想过市场文学与文学市场,但显得路子太窄;后考虑过文化产业,但与古代文学不太切合。经大家集思广益,考虑到经济文化与文学的题目,而经济文化似乎又太宽泛,拿不定主意。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一直倡导发挥学校学科优势,使财经大学的文学研究走与全国重点大学错位发展的新模式。此次他建议由他带队,率中文学科带头人和系领导(张觉教授、祁志祥教授)亲自到北京,咨询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义先生、党圣元先生、胡明先生、王保生先生。四位先生对“经济文化与文学”的提法表现出很高兴趣。胡明先生将其修正为“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回来后得到全系教师认同。随即在第二年(1998年)10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上海财经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全国学术研讨会。次年又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在上海联合召开“文学遗产与古代经济生活”全国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与会代表近百位,会议均开得很成功。此种研究路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并认为从经济生活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 20 世纪古代文学研

研究的新路径和新亮点。同时,《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报刊杂志,刊载会议报道和与会代表照片。《学术月刊》、《河北学刊》、《云南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学理论研究》等接连刊登了百余篇相关论文、笔谈,《文学评论》创刊年第 1 期还专门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的研究专栏。河南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两部论文集(《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去蔽、还原与阐释: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近 150 万字),从而在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随即人文学院又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中心”,开通了“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网”,及时传达我校与全国学界研究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的信息,交流国内外学界的新学术成果,旨在将这一研究做大、做实、做强、做长。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中心”建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规划下一步新的研究计划:每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立足于自己多年研究的领域,再辟新径,确定从经济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具体课题,这些课题包含多部学术专著,总名为“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此计划得到学校和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列入上海财经大学“‘211’三期学术研究平台项目”。丛书的研究对象几乎涵盖从上古文学到当今网络文学的漫长历史,涉及文学研究新经济视角与分析方法、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的学理考量、宫廷经济生活与宫廷文学、士族经济生活与山水文学、地域经济生活与流派文学、城市经济生活与市民文学、刻书业与文学发展、家庭经济生活与文学、身体消费与宋词、园林经济生活与

休闲文学、信息经济与网络文学等不同侧面。

计划一出,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高克勤先生的支持,表示愿意承揽此套丛书出版工作。我们对他的鼎力相助表示真诚的谢意。同时对欣然允诺担任此套丛书学术顾问的袁行霈先生、章培恒先生、王水照先生、郭豫适先生、袁世硕先生、黄天骥先生、项楚先生、董乃斌先生以及胡明先生、詹福瑞先生、陈洪先生、莫砺锋先生、李炳海先生、孙逊先生、郭英德先生、刘跃进先生、王兆鹏先生、廖可斌先生、陈大康先生、赵逵夫先生、蒋述卓先生、韩经太先生、黄霖先生、赵敏俐先生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关怀、支持我们的学界前辈、同仁和报刊杂志社、出版社的朋友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短,作者水平有限,此套丛书虽成体系,但在探索过程中难免存在着种种不足,我们真诚地期望读到此书的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前辈与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许建平

癸酉年 元月写于上海财经大学

序

摇摇文学本来如同生活一样,五彩缤纷,千姿百态。读者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接受或批评,自然会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一部《西游记》,“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或说它是“寓言”,或说它是“游戏”,如此等等,恐怕永远难以用一种说法来一统天下。但是文学界常常有的人喜欢登高一呼,希望大家跟着他的指挥棒转,用一种眼光去看、用一个框框去套,同时也有更多的人也习惯于听着“一犬吠声”而“百犬吠影”起来。于是上下呼应,刮起了一股一股的风。当刮起用文学的眼光读文学的风的时候,就只讲形式,讲情感,讲结构,讲语言,把所有的社会历史批评都贴上了“庸俗”的标签,乃至把整个“外学”都一脚踢开;当看见人家又打出了“文化批评”的大旗后,又拼命地从漫无边际的“文化”中找一个角落来管窥文学作品,于是乎文学所研究的相关“外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种现象好不好呢?应该说是既好又不好。说它也有好的一面,毕竟一阵风来,大家跟着把一类问题搞得更深更细了;说它不好,就容易引导做学问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跟着风转,用框框去套,产生片面化。如今,放在我们面前的朱丽霞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我认为它还是有眼光看准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值得

研究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把它搞深搞透,才有了它的真正的学术价值。

游幕,本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迫于生计,或出于友情,或寻求发展,就离乡背井,在权贵势要的幕中从事文字或谋划等工作,或随幕主辗转他方,或与幕僚切磋诗文,对个人的创作与流派的形成都很有关系。古人早就主张研究文学要“知人论世”,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作品往往做得较粗,做“知人”的工作,即使如“年谱”之类的著作,也往往着眼于一些家国大事、文人交游、诗文系年等等,大的空的多,小的实的少,一些作家给我们的印象几乎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为游览而写山水诗,为慰藉而作送别诗,为相思而写爱情诗,对他们的生存状况往往不求甚解。作家进行创作时,其生活状态怎样?衣、食、住、行如何?家庭的经济来源何在?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而实际上,文人的物质生存条件、经济来源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成就的高低,所以很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今对于文人游幕生活的专门研究,就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来源、物质生活等生存方式进行一个方面的具体、细致的考察,也就是将“知人”工作细化。可是在过去,对于幕府的研究,只是治史者较为关注,像郑天挺、刘樊、缪全吉、朱东安等都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至于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幕府,相对比较薄弱,只是在近年来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受人瞩目的成果,如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5年版)、《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开始对文人游幕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了专门研究,马茂军《西京幕府作家群的散文创作》(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1995年),对宋

代幕府与文学之关系也作了探讨。但是,对于明清以降文人游幕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对于明清之际作为知识精英的遗民的研究,向来多集中于他们的道德情操和文学成就,很少关注他们的生存处境,去研究他们的游幕问题。而今丽霞教授就以明清之际游幕问题切入,去检视当时包括遗民在内的文人的生存境况和文学活动的真实面目,探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文学发展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新审视和思索明清之际文学演变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丽霞教授的这部著作,以大量的实证材料论证了遗民游幕与易代之际文坛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该研究打破了以往认为游幕是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旧说,论证了多数文人游幕最基本的动机是为了生存。尤其是清初,许多遗民面临生活绝境时便走向游幕之途。这是遗民研究中极为重要又被忽略的一个角度。她认为,当时的士大夫对自己生命价值有三种思索和寻求:殉国难、作遗民、仕新朝。其中,殉国和终于隐者的行为证明了他们对故国的道德责任。事实上,许多隐士最初选择隐居,主要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因易代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其家中资财,大都可以供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丰衣足食,并不存在生存危机。文酒诗会,豪饮狂歌,他们仍生活于晚明那种文化氛围中。但这种纵情长歌的闲适逍遥并不能持久。数十年的遗民生活之后,他们面临着艰难而空前的生存压力。尽管许多遗民曾得到出仕新贵的经济援助,但没有人因慕其高尚的道义而永恒地提供资助。著名隐士陈伯玘于顺治十四年(1657)流落白门,旅况非前,“卖书卖墨过残年”(方文《道上遇陈伯玘有感而作》,《蠡山集》卷三),徐州遗民